

# 試論我国生藥学改称药材学的意义

赵 守 訓

南京药学院药材学教研組

我国古时的药物书籍多以“本草”为名，历代有不少重要的本草问世，例如神农本草經、本草經集註、新修本草、証类本草、本草綱目等，不仅是國內著名的医药典籍，也是世界各国知名的重要药物著作。至清代，虽然沒有超过象本草綱目这样的书籍，但为数仍然很多。可是在民国期間，本草系統的新著作，为数却甚少。而在药学教育中，另出现了“生藥学”这一学科。解放后，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医药教育中产生了以“中藥学”命名的学科。同时，有一些药学院校，将生藥学改变为药材学。在我国医药界中，原已发生对生藥名称有不同的理解，今又出现了生藥学与药材学名称和內容的認識問題，为有利于实际工作需要和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实有将此等名称加以討論明确的必要。生藥学原为日本学者首先应用的名称，传到我国也有半个世紀的历史。我国生藥学到药材学的演变，这是中、日两国社会性质及医药事业发展有所不同的結果。今試从生藥学的历史及其发展的情况，来論証药材学更符合于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茲将所搜集的有关資料及初步见解論述于后，以供药学工作者的参考，并热誠地希望多給批評指正。

## 一、生藥与生藥学名称的来源及其含义

1. 我国古代所用“生藥”一詞与今日生藥学中所指生藥二字，其来源不同，含义也有区别。

我国自古对医疗和預防疾病的物质称为藥、藥物、药材或药品，这是古今医药书籍中很常见的名称，但有时偶而有应用生藥一詞者，其来源和意义与今日生藥学中所指生藥二字是否相同，是本文首先应弄清楚的問題。

明史职官志所記載的太医院官职中有“生藥庫惠民藥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对其职务記述有“凡天下解納药材，俱貯本院生藥庫，以御医一員与大使一員，辨驗收放”；“凡太医院所用藥餌，均由南京礼部收到各地解來生藥制造”。又如清史稿职官志中載有“凡药材出入隶礼部，十六年（1659年）改归本院（太医院），十八年生藥庫复隶礼部”；“凡遇內药房取用药材，由本院申呈礼部轉資戶部，于庫內查取，如有缺少給价采买，俱以生药材交进，由內药房医生切造炮制”；“藥料鮮竹，均归戶部办理，題定每年归河南解鮮竹三百株，由本部札付太医院，烧取竹瀝”<sup>[1]</sup>。这些內容，可以說明我国明、清两代以应用药材名称較为普遍，藥料是指制藥的原料（如鮮竹），不一定是药材，而生藥則是原料药材，即生藥

材。乐松生在“北京同仁堂的回顧与展望”一文中提到：“清慈禧当政后，認為同仁堂的藥好，曾令代制宮內服用的成藥。在此以前同仁堂只交进生藥”<sup>[2]</sup>。这就更加清楚我国古今偶而应用生藥一詞，是指生药材而言；是为了和加工药材或成药加以区分。

近代我国出现的生藥學及其所指生藥一詞，可以肯定的說是来自日本。日本在1890年已有生藥學著作出版<sup>[3]</sup>。所用生藥二字与汉字相同，如萩庭丈寿、三桥 博曾記述生藥即キダスリ，原写为“木藥”，是制熟前的藥，明治前作治疗应用的药品完全为天然产物，那时生藥指全部分的药物。他指出把キダスリ讀作生藥（ショウヤク），Pharmacognosy 給以生藥學名称，这都是使用成为现代意义名称的开始<sup>[4]</sup>。这里說明了“生藥”在日本原写为木藥，是指生的天然藥，但自从将 Pharmacognosy 譯为生藥學，生藥二字才代表了譯自 Pharmacognosy 中所記載的药材。

我国較早將外来的生藥二字，引入正式书籍的为中华藥典。該书內容主要是参考日本及欧美藥典編纂的，在其凡例中記有“生藥之原植物或原动物除习聞者外，均于来源項下記明有学名及所隶之科属，其系本国产者，并記明本国某地方产等字样，以引起国人对国产药材之兴趣”<sup>[5]</sup>。該书所收載的生藥烏头，即欧烏头 (*Aconitum napellus L.*)，而对我国产量大和应用广的烏头及附子則未提及。可知此处应用的生藥二字是外来的，已不同于我国原有的名詞。也說明我国多习用药材二字。又如民国22年(1933年)在卫生部卫生实验处化学药物系的工作任务中，也提到“掌理中国药材及各項生藥之品质、性状、功用及其精制方法之研究……”<sup>[6]</sup>，这就更加清楚，当时大家对药材和生藥二名詞有明显的不同理解。

又据我国近代各家生藥學者对生藥二字含义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二种：一、認為生藥系采自生物体的藥物，兼有生貨原藥之意。例如赵矯黃、徐伯鑒的記述：“今日生藥除矿物殆已不用外，亦以植物界所产之生物占大部分，动物界产者次之，采取药用植物与动物，供药用之部及其产物，以一定时令采集，經一定手續調制之，干燥之，复规定适当大小便于医药之应用者，此名曰生藥。生字包括二义，即生貨原藥之意，兼含采于生物界之义也”<sup>[6]</sup>。与以上见解大体类同者，还有顧學夔<sup>[7]</sup>、徐國鈞<sup>[8]</sup><sup>[9]</sup><sup>[10]</sup>、王殿翔<sup>[11]</sup>。二、認為生藥系药物属于天然动、植、矿物，采取其一部或全部，經過简单加工的药材。例如李承祜記述：“一切药物属于天然的状态或加以简单的人工調制者，謂之生藥。換言之，一般植物界之树皮、草根，动物界之蛇蛻、兽骨以及矿物界之岩石、矿物或化石等，如以之供药用时，均可名为生藥”<sup>[12]</sup>。与此见解类同者有樓之岑<sup>[13]</sup>。但所有我国已出版的生藥學中，仅樓之岑著作中載有滑石、白陶土等数种矿物药材，徐國鈞、趙守訓著作的附录中簡表收載了数十种矿物类中药材<sup>[9]</sup>。樓之岑在討論普通生藥學的內容时，也曾指明是专講动、植物生藥的<sup>[13]</sup>。如此看來，我国生藥學所研究的药材，可以說都是生物药材。但是此等偏于認為生藥是生物药材的见解，已和我国原有对生藥的解释——認為是生的药材之含义有了一定的距离。这些见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主要是受了日本生藥學的影响。

## 2. 日本学者所用生藥學名詞是譯自西洋作为现代意义的名詞出現的。

日本在应用生藥一詞之前，多用药材、和汉藥，另有药材名称（例如草药商也称为药材商）。日本的医药自古均附有汉名，致使日本自己的医药也不可考<sup>[14]</sup>。其所用医术、本草和药品，在明治維新前均自中国传去，故多与我国相同。对药物也有藥、药品、药草、药材等名称，并将由中国传去而变为日本的药物叫“和汉藥”<sup>[15]</sup>。如果我們查閱日本的和汉藥

文献一书(1868—1938)，在其目次內容中就会看到有和汉药、日本的药材、諸外国的药材等专栏，而生药鑑別、生药成分項目在修治及植物成分专栏下才找得到，且在明治29年(1896年)，始出现有以生药为題名的文章<sup>[16]</sup>，可见日本明治到昭和初年以应用和汉药及药材等名詞較为普遍，而生药名詞出现的很晚，且亦少用。

日本应用生药及生药学名詞亦不过八十余年。据日本学者萩庭丈寿、三桥 博的記述生药学是大井玄洞当 Pharmacognosy 被介紹到日本时，在1880年首先采用的日本譯名<sup>[4]</sup>。我們所見最早的生药学专著，是下山順一郎編著，在1890年出版的<sup>[3]</sup>。木村康一曾謂：“日本的生药学可以說是自东京帝國大学第一代生药学教授下山順一郎博士开始”<sup>[14]</sup>。下山順一郎在其生药学正文頁首，将“隱花类植物的生药”下註明德文“Drogen der Kryptogamen”，这是日本較早記述生药二字的正式文献。此后生药二字在日本才逐渐应用开来。例如日本药学杂志1892年各期，只有在某广告中的学說一栏下有“生药概論”的內容<sup>[17]</sup>；并见某新办药校广告中，列有野金太郎講授生药学及下山順一郎講授生药学、生药学实地实习及显微鏡上检查法等内容<sup>[18]</sup>；在1905年第1期中，又出现了一篇以“滿洲”的生药为題名的文章<sup>[19]</sup>；到了1912年第1期，才开始辟有生药学专栏<sup>[20]</sup>。这些內容，虽然不足以說明生药学及生药的名称在日本出現时的全貌，但可以肯定其应用历史至今仅八十余年。

日本学者討論生药及生药学来源和含义的专文，多零星的散见于各专著中。木村康一認為从来一般的把生药讀为キグソン，即所謂和汉药，但现今在药学方面把这个名称讀成シャウヤク，索性以西洋生药为主，和汉药为輔来解釋<sup>[14]</sup>。且木村康一在其生药学中的生药及生药学历史一章下，立有“D.中国的本草和汉药；E.中国现代的生药”等标题，也可以說明他对生药和我国原有的药(汉药)，有不同的理解，桥本 亮的见解更較明确，他认为在明治时代，把由西洋传到日本的常用药作为基础，其后多少变成日本式的一些药品，用生药名称；在此以前由中國传去，而改变为日本的一些药品，称为和汉药，他并指明这是西洋起源和东洋起源的分別<sup>[15]</sup>。下山順一郎在其生药学中，将生药下註以德文“Droge”可能就是为了說明生药二字的来源及所表达的含义。

日本学者多認為自 Pharmacognosy 介紹到日本給以生药学的譯名，是作为现代意义学科的开始，木村康一曾說明现代科学发达了以后，就采用了生药学这个日本名称<sup>[4][14]</sup>。并謂：“下山教授时代是日本生药学的开发时代”。这些說法都反映了，日本学者認為生药学是日本創用的。

至于日本学者对生药学的定义及其内容范围的解释，大体上有下列各說法：認為生药学是“研究医疗目的所用天然产物的學問”<sup>[3][21]</sup>；是“研究天然药物由生产到消費過程的學問”<sup>[4][21]</sup>；是“生药的商品学”<sup>[14][15][21]</sup>；另藤田路一較詳細地指出生药学的狭义解释是研究生物的干燥体或一部分，作为药用資源生药的學問；而广义的解释为研究生药的制剂和成分、制法、品質、已知生药的改良和发现新天然药物的知識所必要的、基本的學問<sup>[22]</sup>，又木村康一<sup>[14]</sup>及刈米达夫<sup>[21]</sup>曾指出生药也包括矿物类药材。可是本文所提及的日本生药学著作，其內容中都未收載矿物类药材。所以，可以說中、日两国各家生药学內容的范围是一致的。

### 3. 七十余年来中、日两国已出版生药学的内容类似，体系也大致相同。

欧美药学中出现 Pharmacognosy 这一学科，最早起源于1815年“C. A. Seydler 論文

的題目“*Analecta Pharmacognostica*”。英文“*Pharmacognosy*”原來自希臘文 *Pharmakon* “藥”，*Gnosis* “知識”，其意義為藥的知識。這是古代藥物學在植物學及化學的輔助下，到 19 世紀初發展形成的一門獨立學科<sup>[9][14]</sup>。日本到了德川吉宗（1714—1744）時代，獎勵荷蘭藥草的研究，輸入西洋醫學，明治維新後，萬事崇拜歐洋，並于 1884 年下令禁漢法醫，改行西洋醫術<sup>[14]</sup>。此為 *Pharmacognosy* 传入日本并出現生藥學的時代背景。下山順一郎依據其老師德人 Flückiger 所著的 *Pharmakognosie* 為藍本，並參考了 Marme J. Moeller, Hager 及 Meyer 諸氏著作，編著了日本最早的生藥學<sup>[14]</sup>。該書主要收載了歐美經過現代科學整理研究的藥材，而為當時輸入日本的西洋醫學服務，並倡導對世界各國所用藥材的研究。日本學者橋本亮在論生藥學時曾記述生藥是明治時代由西洋傳到日本的知識作為基礎，其後多少變成日本式的藥<sup>[15]</sup>。此等資料，說明了日本生藥學內容的主體，是西洋來源的藥或多少變成日本西醫所用的藥材。其後日本各家生藥學的內容中，雖然不斷地增添經過研究的和漢藥，但其基本體系並沒有什麼改變。

我國第一本生藥學，是趙燭黃、徐伯鑒於 1934 年出版的生藥學（上冊）<sup>[6]</sup>。那時的時代背景和日本出現生藥學時類似，我國正处在西洋醫學逐步輸入並全盤學習歐美資本主義的時期，國民黨反動政權中央衛生委員會還議決有消滅中醫的提案<sup>[1]</sup>。這時我國西醫成了受寵的醫學派系，趙、徐生藥學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這本生藥學的凡例中曾指明：“本書各論正文以下山氏之生藥學為主體，參酌 Gilg 氏之 *Pharmakognosie*, Kraemer 氏之 *Scientific and Applied Pharmacognosy* 等書。并加入著者最近國藥之研究數種。各論附錄以本草綱目所載之國藥為主體，參酌刈米氏，木村（雄）氏著邦產藥用植物，中尾氏、木村（康）氏著漢藥寫真集成，植物研究什誌，其間關於著者之研究心得加入之處甚多。”又云：“正文中專載現今世界各國著名之生藥及公認為確有效之國產藥材，及可以代替外國產生藥，曾經鑑定之品。附錄中以採用國產藥材為主體”<sup>[6]</sup>。這些記載較明確地說明了我國生藥學的出現，並不是由我國自己的古代本草演變發展而形成的新學科（當然不能說沒有影響），而主要是 Flückiger、下山體系的學科在我國發展演變而產生的。當然，這門學科在各家學者，如趙燭黃、徐伯鑒、葉三多、李承祐、樓之岑、徐國鈞等努力下，已做了不少工作，相繼充實了國內外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自己國家的藥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若就已出版的十冊生藥學<sup>[6][23][7][12][8][13][24][9][10][11]</sup>內容看，多半以敍述西醫應用的藥材為主或僅以西醫用藥方式研究藥材，使人感到都還沒有完全脫離外國的體系。如將各家著作中，所收載的我國常用藥材如烏頭、甘草、大黃等的內容，一一對比其所記載的項目內容，就可看出絕大部分都是一樣，且所提到的制剂及效用，也是西醫應用的，有的著作中雖然附帶提及我國中醫的用法，但極為簡略。自下山生藥學問世以來，以生藥學三字命名的著作已近二十冊，就其所研究的內容和範圍來看，可以說已形成為一種有一定形式和體系的學科。

## 二、試証我國生藥學改稱藥材學是生藥學內容 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

我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長期累聚了我國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丰富經驗和理論

知識，其中的确蘊藏着許多寶貴的东西，是一個“伟大的宝庫”。历代都有不少重要的医药书籍，來反映我們这方面的成就。可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間，我国原有的医药学，不但受到买办資产阶级医药制度的压制，还遭到西洋医药的排挤，虽然因为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坚决反抗而未被烟沒，但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且舍本取洋和忽視祖国医药文化遺产的情况非常严重。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在医药学的課程中，已訂出了“生药学、粉末生药学”等課。生药学名称，早已通用于日本药学教育中<sup>[18]</sup>。当时我国的教育制度，几乎是全盘抄袭日本和欧美的，生药学这一学科也不会例外。解放后，中国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药材学就是这个新时代中教育革命的一項成果。

假如我們回顧一下数十年来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那就能体会到生药学到药材学的演变是很自然的事。例如前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虽然創办較晚（1936年），但其生药学早年的教学內容，仍然类似外国的“生药学”一样。当时学生学习這門課，很难体会出是中国式的課，不但选用的教材是美国教本，就是筆記也全用英文抄写<sup>[25]</sup>。因之，在实质上还談不上是我国的一門学科，只不过是資产阶级买办教育中的一項点缀品。以后生药学的內容虽有所改进，但是仍然局限于西医所用的植物和动物类药材，并以西洋形式进行教学，对祖国医药学基本上是采取歧視和虛无主义的观点。

解放以来，在不断的教學改革中，我們才逐漸重視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并相繼到医药工作现场去学习。1959年夏，我們又进行了南京地区中、西医院使用中药材及生药情况的調查，使我們进一步了解到南京10多个大的中、西医院全年使用药材的情况。西医所用的药材，如甘草、大黃、洋地黃、颠茄、龙胆等，絕大多数是以酊剂、流浸膏等制剂形式应用，只有少数是用粉剂或片剂药（計10余种），另有若干揮发油，树脂、树胶及油脂类药材（計20余种），共計150余种。各院西医应用的中药材及其制剂比1956年以前，有显著增加的趋势，但各院中医应用药材的数量更多，且在实际工作中常发生药材真伪及品質优劣的問題，这对我们生药学教育工作者來說，有很大的启示。同时，各西医院积极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也相繼开设中医科和中药房，这种在医药界出现的新情况，对高等药学院校的教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在1958年秋，院領導組織我們到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去参观学习，使大家亲自看到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在三面紅旗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也体会到党和人民对我们药学工作者殷切地希望和要求。依照党的教育方針和理論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則作比尺来对照，就更觉得我們的教学內容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需要；也进一步发现自己天天接触的“生药”及“生药学”这两个名詞，并未被广大卫生工作同志所理解，除了少數学过生药学的同志外，甚至連中药药工和医护人员也不大<sup>懂</sup>，这才引起我們开始注意生药学来历的考証工作。在院領導亲自参加指导下，我們又进行南京市中药資料的整理<sup>[26]</sup>，以充实新教材，深感到依据我院新的教学內容，采用我国的传统名称“药材”定名为“药材学”才名符其实，也与我国实际情况吻合。这也是由于解放以来，通过各次教學改革，在生药学的教材內容中、逐年不断地增加我国习用的药材，到1957年止，已有中药材170—180种，占全部药材的80%，并有常用中药专章，如此就促进了这种演变。同时在1958年前后，我組全体同志深入实际一致努力，并认真学习南京、杭州、济南等地区中药材加工

炮制技术的經驗，并在总结中药材实际生产、应用和中药老师傅宝贵鑑別經驗的同时，进行了文献查考及研究工作，以科学方法綜合整理，編出了新药材学参考书<sup>[27]</sup><sup>[28]</sup>。我国药科学校很多，有的历史还較早。在全国解放前，除了革命根据地的药学教育<sup>[29]</sup>外，生药学的教学情况是类似的。解放后，各药学院校的生药教师，对这門內容脱离我国实际情况的学科，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都有了內容比較丰富和比較結合我国实际的教材，并不断地写出了新的譯文或出版了新著作，还有很多药材方面的科研报告和論文发表。特別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药学工作者不断地做出了有价值的专著；例如各种植物志、药材志、中藥志及有关药材資料，相互交流，更促进了这門学科的发展。在这种新形势的要求下，有不少药学院校曾将生药学改为药材学，我們初步知道的就有10余院校之多（如南京中医学院中藥系、兰州医学院药学系、南昌药剂学校、天津中藥学校等），这不但說明有較多的药学工作者，对生药学在我国发展演变的看法一致，而且从这些学校不謀而同的将此学科正名为药材学一点看，就显示着这門学科发展的自然趋势。同时，也說明一門学科的性质，必須符合于自己国家社会的需要，其內容也必須依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向新的方面发展。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示我們：“新陈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則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应当是指导我們正确分析客观事物发展的理論依据。就生药学而言，本来是属西洋系統，原为传入日本的西洋医学服务的新学科，但在传来我国的数十年过程中，由于中、日两国社会情况的变化不一样，而时刻都在剧烈地变化着，若根据我国药学方面的实际东西，逐渐在我国生药学的内容中占有絕對优势的情况来看，我們的生药学到药材学的变化，正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既然日本学者能在学习西洋医学的基础上，結合日本具体情况借用日本形式的学科——生药学，那么，我們为什么不用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学科名称——药材学呢！如果我們只想在充实自己的国家的药材內容后，仍然繼續沿用这样一门有一定范围的外来名称——生药学来概括我国极为丰富多采，具有民族特色，并且在結合了现代科学猛速发展着的有关药材知識，那就不仅会有张冠李戴的感觉，还会对一些我国药学实际工作中的宝贵知識加以限制的可能。由此論証，应当有理由說：我国药学教育中的生药学改称为药材学，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医药教育事业中这一学科发展的趋向。

几年来，我們体会到这个“药材”名称，不但是我国古代用过，而且是现在广大羣众、广大药工同志所喜用的名称，在所有有关植物及药物的书籍中，所有报刊、杂志上以及政府法令、指示，都会发现大家所习用的是“药材”而不是“生药”。如果就我国各家生药学著作仔細学习，也能发现他們也常用药材二字。例如赵矯黃、徐伯鑾在論生药学定义时謂：“研究药材上各方面应有之学理、實驗而成一种之独立科学”<sup>[6]</sup>；顧学裘謂：“生药或称药材”<sup>[7]</sup>；李承祐謂：“我人研究斯学，一方面固不可忽視国际性药物之应用，同时对于国产药材。更应尽力搜研”<sup>[12]</sup>；徐国鈞謂：“生药学的簡明定义，就是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利用生物界的药材，为人类健康服务”<sup>[8]</sup>；棲之岑謂：“本草 药材一千多种……我們国家有很多特产的药材……”<sup>[13]</sup>；王殿翔謂：“利用自然界的产物，采用其有效部分，供用于医疗方面者称为药材。药材之属于天然状态或加以单簡的人工調制，未經精炼成为制品者，称为生药”<sup>[11]</sup>。这些內容也有力地說明“药材”是我国大众的共同語言。虽然近年

来，有的著作如中藥學<sup>[30]</sup>、中藥志<sup>[31]</sup>中，有时也偶而采用了生藥这个名詞，但如果从全文仔細了解，就会发现此类书籍中，在少数地方配上生藥二字，反而会产生对此等名詞的运用上有不自然和不統一的感觉。这也是由于大家对生藥二字存在着不同的認識，或者是生藥学工作者在参加編寫时偶而写上的。又如現尚在編纂中的中國藥典新版初稿中，也曾出現类似的矛盾，有人希望将甘草、大黃等药材各分为二，一个放在生藥部分、一个放在中藥部分，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至于药材学的名称，近知过去也曾有过，叶三多教授曾談到，在三十年代初，上海中法药科創办时的教学計劃中曾拟用药材学为課名，可能因为当时我国早有学校，如軍政部陸軍軍医学校药科、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等，已有生藥学課，周軍声教授还編有講义（系所见我国最阜的生藥学講义）<sup>[32]</sup>，所以后来仍用生藥学。如果我們將这一系列的資料联系在一起，就能了解到羣众、广大药工及专家們都习用的名詞，在五十年代末才出现在医藥教育界中，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而是解放后时代起了变化，中医中藥和西医西藥事業都同样得到突飞猛进的結果。

### 三、生藥学、药材学、中藥学是来源和性质上不同的学科

为进一步說明生藥学和药材学的性质，此处首先討論中藥学这一学科的来历，然后再談此三学科的性质和关系。

我国古时药物书籍多以本草为名。对于外国来源的药材，有时加“胡”（如胡黃連、胡桃、胡荽子、胡椒、葫芦巴等）、“番”（如番泻叶、番木籠、番紅花等）等字。到了明代才开始有西洋医学的传入，如意大利人利瑪竇（1581年來华）的“西國記法”，为第一部传入中国有关西洋医学的书籍<sup>[1]</sup>。但当时尚无中、西医药之分。至清朝末年，西方資本主义逐渐发展，并形成侵略势力，向我国不断地輸入西洋医药。十九世紀中叶起，外国人在我国开办医院者日多，逐漸有了各种西洋和日本医药书籍的譯著，其中有西医略論、西藥略釋、西藥大成、中西医方会通、中藥淺說、新本草綱目等书<sup>[1]</sup>。可知我国在西洋医药学大量輸入后，才出现了西医西藥，并将自己原有的医药改称为中医中藥或国医国藥。辛亥革命以后，更趋向于学习欧美和日本的資本主义制度。药学教育中的生藥学，最初就是介紹西洋药材知識为主的課程。近百年来由于西洋医藥的影响，本草系統中較重要的书籍甚少，中国药学大辭典（陈存仁等，1935）已是較大型的編著。而现代实用中藥（叶橘泉，1952）中国药物理学（时逸人，1953）都是在解放后完成的，至五十年代末，才出现了我国第一本以“中藥学”为名的著作<sup>[30]</sup>。清末以来，西医西藥一跃而为我国卫生事业中强有力“宠儿”，被打入“冷宮”的中医中藥，只有在解放后才解除了买办資产阶级的束缚，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藥学正是中医中藥在党的撫育下，重新結出來的果实。中藥学是研究在中医理論指导下，医疗所用中藥的来源、产地、功用、炮制及应用方法等知識的学科<sup>[33]</sup>。因之，中藥学的出現是我国古代本草的演变和发展。

我国生藥学来自日本，日本生藥学又来自欧美，虽然都是西洋医学体系的学科，但由于两国社会情况演变不一样，当然其发展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日本学者昔日倡用生藥学，就是因为这种学科的主要內容来自欧美，而不同于中、日两国的本草或和汉药书籍。那么，中国的生藥学当我们自己药学系統的內容，增多到一定数量时，必然也会和日本的生藥学不一

样，而发生性质上的变化。生药学中研究药材的近代科学方法，虽然对我国中药学和药材学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生药学却不可能代替我国这两门学科。

就药材学而论，它是研究中、西医常用药材的学科，其主要内容是在重视祖国医药学并结合现代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来研究药材的来源、生产、鉴定、成分和应用等理论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有关药材真伪和品质的知识。所以可以说药材学是既继承了我国古代本草的重要内容，又吸取了现代中药学、生药学以及世界各国类似学科（如 Pharmacognosy \* 和 Materia Medica 等）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成就；是在我国医药事业新形势的影响下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学科。从内容上来讲，药材学和中医学不同，它不仅研究常用中药材，也研究常用西药材；不仅要继承祖国医药的精华部分，也要吸取世界各国现代的研究成果。从性质上来讲，它已不属于外来体系的学科，而成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大众化、民族化又现代科学化的学科。同时，又是具有我国民族特色和反映了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特点的学科。

### 結 尾 語

二十世纪已进入六十年代了，世界上各种科学都在飞跃地发展着，有关药材知识亦不会例外。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汉方医后，其和汉药多用于贩卖的成药或作为民间药<sup>[34]</sup>。后来的情况虽然稍有改变，但以西洋医学为主的局面，却没有多少变化。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对生药及生药学名称和含义的热烈的争论。例如在1960年的日本生药学会名古屋大会上，讨论有关植物、生药及局方（日本药局方）生药名词的问题时，下村 孟曾提出了生药（ミヨウセク）名称可不可改换为天然药、植物药、和汉药、天然形药物等称呼的论点。他认为生药学（日文汉文相同）对药学界人士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但一般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是草药，有的认为是未熟的、生的药等，应当另改名义相符的名称。又在讨论生药学在药学教育中的地位时，木村雄四郎一再重复地指出，现代日本生药业界称和汉药为生药类，有比较现实的重要意义，因为“向来生药学的讲授内容是以欧美生药为主”。他并介绍了日本大学已设有“和汉生药学”的选课。此外，栗原广三提出另一种主张，他希望在药科大学的生药学课中，讲授汉方医学生药的应用知识，柴田承二和栗原广三答辯，认为这是药学实际的要求和学院式理论知识（Academism）的矛盾<sup>[35]</sup>。这清楚地说明有些日本学者对生药及生药学的名称和内容，也有强烈的改革要求。我们中国学者，更应当客观地、全面地来分析研究自己学科中所存在的矛盾，更好地来推动我国药学的发展。中、日两国的社会，几十年来产生了极大的差别，以医药卫生事业而论，我国情况大大不同于日本，我们不仅是西医西药日益进步，中医中药也在迅速发展。而且中、西医药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更会突飞猛进。这种新局面，是在我国伟大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所形成。因之，我们的医药教育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特点。我们不只是要吸取世界上最新科学成就，更重要地是为了解决自己国家的实际问题，发展祖国医药文化，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的医药教育体系，虽然有中、西二大系统，但决不能说药学院只管西药材，而不问中药材。如果在教学中不讲授中医及民间医应用的重要的有效药材，那么，不仅教学没有丰富的内容，也无法要求学生了解一定的中

\* 註：徐国钧教授从各国文献考証 Pharmacognosy 如译为汉文，也宜称为药材学。

药材知識，更難說對祖國醫藥遺產的繼承和發揚。這是完全脫離我國社會實際的一種想法。如果我們由於我國的药材經過現代科學化以後，而試圖改變其大眾化的傳統名稱另定名為生藥，那麼，這不僅會出現學院式教育脫離我國實際的情況；同時，也很难扭轉廣大人民的正確習慣。又我國醫師所用的藥，雖然也有中、西二大系統，但中、西醫所用的药材，如大黃、甘草等都是同一種物質，只是加工方法和應用方法有些不同，對药材的品質要求却往往是一致的。药材經現代科學化只是對其本身的認識更深刻了，並沒有改變药材的本質。所以，也沒有必要改稱為這個現在大家都很生疏，也不易正確理解的名稱——生藥。而且我國中醫所用药材有不少是進口的（例如番泻叶、番木籟、丁香、沒藥、乳香、阿魏、安息香、芦薈等）。另有很多重要的國產药材，早已成為世界性药材（例如大黃、甘草、麻黃、八角茴香等）。同時，這些药材也是早已在各國 Pharmacognosy 及其類似書籍中收載了的；同樣也在我國本草和中藥書籍中早已收載了的，過去都稱之為药材，並沒有感到有不妥之處。因之在醫藥教育中，將中藥學所講的中藥材，又在生藥學中對同一物質稱之為生藥是不妥當的。我們不能把醫療用的药材，作為舞台上的演員來看待，對同一种药材只因為多了一點新的描述又改稱為生藥。而是應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明確這一問題。此外，在論談药材的品質和應用時，也往往需要全面的談到药材來源、加工炮制、內部構造、成分和用法，如講烏頭附子時，不談炮制方法及成分性質，就無法講其品質標準和中、西醫應用的特點。所以若按原來生藥學的方法進行教學或研究药材，就必然會對中、西醫應用的同一药材所應有的完整知識，產生分割片面討論的弊病。本着药材學的性質，我們就可以將凡是對研究我國中、西醫所用药材有益的知識，特別是有關药材真偽和品質方面的知識都加以吸取，不會因其屬於中或因其屬於西，而附加以各種條件限制。所以說我國的生藥學改為药材學不但名符其實，而且也有其重要的實際意義。這樣，不但有益於實際工作，更會給應用药材提供了比較豐富的完整的知識，也必然對研究药材、提高药材質量更為有利。當然，目前的药材學雖然和生藥學在性質和內容上都有了變化，但僅是一個開始，還需要不斷的充實提高，才可以真正名符其實地反映出我國這方面的成就。但我們相信，在黨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一定會對人民保健事業，放射出更燦爛的光芒。

致謝：承吳學義教授對日本文獻給以指教，并見告日本情況，謹此致謝。

## 参考文献

- [1] 陈邦賢：中国医学史，1957年11月，第230、231、236、274、278、279、329、340、254、309、312、313、314、326頁，商务印书館新版。
- [2] 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顧與展望，光明日报，1961年7月17—19日。
- [3] 下山順一郎等：生藥學，1943年3月，第27增補版（1890年6月第一版）第1頁。
- [4] 萩庭丈寿、三桥 博：医藥資源，1952年11月，第2、1頁，日本共立书店。
- [5] 伪卫生部：中华药典，1931年8月，第1、48頁。
- [6] 赵燏黃、徐伯鑒：生藥學（上冊）1934年4月，第1頁。
- [7] 顧學裘：生藥學，1947年1月，第1頁，商务印书館。
- [8] 徐国鈞：药用植物及生药学，1954年10月，第62頁，人民卫生出版社。

- (9) 徐國鈞、趙守訓：生藥學，1958年3月，第1頁，人民衛生出版社。
- (10) 徐國鈞、趙守訓：生藥學（中等醫藥學校試用教科書），1958年2月，第1頁，人民衛生出版社。
- (11) 王殿翔：生藥學，1959年4月，第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 (12) 李承祜：生藥學，1952年11月第1頁，中國圖書儀器公司（1957年7月版第1頁，上海衛生出版社新版）。
- (13) 楼之岑：生藥學（上冊），1955年1月，第1、6、8、9頁，人民衛生出版社。
- (14) 木村康一：生藥學，日本藥學大全，第二卷，1939年9月，第46、53、56、1、2、60、55、56頁，日本非凡閣。
- (15) 桥本亮：藥用植物學，日本藥學大全，第二卷，1939年4月，第260頁，日本非凡閣。
- (16) “滿洲”醫科大學：日本和漢藥文獻，1940年9月，第1、10頁。
- (17) 日本藥學雜志，1892年，119—130期，第88頁附頁2；178頁附頁3；500頁附頁2；616頁附頁4。
- (18) 日本藥學雜志，1892年，119—130期，829頁附頁2。
- (19) 平山：“滿洲”的生藥，日本藥學雜志，1905年，275期，第13頁。
- (20) 日本藥學雜志：1912年，359—370期。
- (21) 剖米達夫：最新生藥學，1953年4月增補版，第1頁（1949年11月初版），日本廣川書店。
- (22) 藤田路一：生藥學，1957年1月，第1頁，日本南山堂。
- (23) 叶三多：生藥學（下冊），1937年7月。
- (24) 山東醫學院藥科生藥教研室：藥用植物學及生藥學，1956年3月，人民衛生出版社。
- (25) 前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劉寶光教授講授：生藥學筆記，1942—1943年。
- (26) 南京藥學院生藥學教研組：南京市中藥調查資料，6冊，1958年11月。
- (27) 南京藥學院藥材學教研組：教育革命的產物——药材學，南京藥學院教學工作經驗匯編，第一輯，1959—1960年1月，第41頁。
- (28) 南京藥學院藥材學教研組：药材學，1960年3月，人民衛生出版社。
- (29) 北京中醫學院1957年班：中藥簡史，1960年1月，第135頁，科學技術出版社。
- (30) 南京中醫學院：江蘇省中醫研究所：中藥學，1959年3月，人民衛生出版社。
- (31) 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等：中藥志，第3冊，1961年2月，第457頁，人民衛生出版社。
- (32) 周軍声：生藥學講義，1929—1930年，偽軍政部陸軍軍醫學校鉛印。
- (33) 成都中醫學院本草教研組：中藥學講義，1960年10月，人民衛生出版社。
- (34) 剖米達夫：和漢藥，日本藥學大全，第2卷，1939年9月，第126頁。
- (35) 高橋眞太郎：日本生藥學會名古屋大會感想記，藥學研究，第33卷，1961年1月號，第61—66頁。